

# 重审“日常生活诗学”：历史分析与观念批判

一行

**【摘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诗学话语中，“日常生活诗学”是最具影响力且持续支配着当下诗歌写作的重要诗学观念之一。在一段时期中，“日常生活诗学”更新了当代诗的方法论并拓展了诗的边界，与九十年代以降的历史处境形成了一种深层呼应关系。但在今天，它自身的局限和缺失也显露出来，“日常生活书写”的泛滥导致了当代诗的危机，因而亟需得到反思。本文重审了“日常生活诗学”的兴起缘由和根据，对这一诗学进行了历史分析和观念批判。

**【关键词】**日常生活诗学；“九十年代诗歌”；事件；“无限诗学”

**【作者简介】**一行，云南大学哲学系。

**【原文出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广州)，2023.6.21~26

## 一

今年四月在郑州举行的诗学会议上，我提出了“当代诗的绝境与危难”这一论题，引发了不少师友的关注和讨论。“当代诗的绝境”的形成，不仅来自于当下诗歌体制的压抑和保守化，而且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诗学理论缺乏创造性更是关系密切。我们今天的诗歌写作和诗学讨论，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着所谓“九十年代诗歌”确立的范式。“九十年代诗歌”构成了一个“漫长的季节”，围困着今天的新诗写作。要走出这一“漫长的季节”，首先需要重审和清理“九十年代诗歌(或诗学)”的一些基本诗学概念和命题。在这些诗学概念中，“日常生活”一词是最具影响力且持续支配着当下诗歌写作的重要概念之一，它不仅是“九十年代诗歌”的基本预设，也几乎构成了当代诗不同派别、写法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在诗学概念群的结构层面，“日常生活”与“九十年代诗歌”的其他诗学概念如“个体写作”“叙事”“及物性”“中年写作”“经验主义诗歌”“口语诗”“民间写作”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看成是这些概念的共同前提。

“日常生活诗学”可作三种不同理解：第一种是指认为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不存在根本断裂性

的美学主张(以杜威《艺术即经验》和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为代表)，它试图在日常生活诸多领域中发现和践行审美，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第二种是以文化研究的方式对日常生活展开的批判或反思(以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和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为代表)；第三种是在狭义的诗歌批评和研究意义上，指那种强调诗歌应以“日常生活”作为动力根源、精神原则和主要书写内容的诗学观念和写作实践。这里我主要是在第三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但是，前两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诗学”也以某种方式渗透和影响到第三种意义的“日常生活诗学”，并成为后者的重要思想渊源。

## 二

“日常生活诗学”在当代诗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是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历史语境促成的。在那一时期中国发生了一场剧烈的社会转型，深入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层面，并对中国新诗的写作状况产生了直接影响。诗人们似乎是突然发现了“日常生活”的存在，从“八十年代诗歌”所朝向的“远方”一下子掉转头来返回“附近”的寻常巷陌。如果对“九十年代诗歌”以及后续近三十年来的新诗现场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大多数重要诗人都认同并践

行着“日常生活诗学”。这表现在两个方面:(1)将“日常生活”当成诗歌的动力根源和书写内容,诗的写作来自于日常经验的感受触发,并且主要是对日常经验的处理;(2)将诗歌写作本身视为一项“日常工作”,也就是用一种注重技艺细节、强调反复训练和练习的工作态度来进行写作,这便是“作为工作的写作”原则。这两个方面也具有相互支持和相互加强的性质:前者提供动力、活力和内容,后者提供加工内容的态度、技艺和方法。这两个方面都构成了对“八十年代诗歌”(无论是朦胧诗还是后朦胧诗)所遵奉的诗学原则的反动。

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些诗人的文章、访谈和诗作来证明上述论点。先来看诗学文本。欧阳江河在1993年发表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中提出“(写作)活力的两个主要来源是扩大了词汇(扩大到非诗性质的词汇)及生活(我指的是世俗生活,诗意的反面)”,明确将“九十年代写作”定位于对日常生活及其词汇的征用。<sup>①</sup>西川在《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中也认为写作要呈现“生活的诗意”,并将其理解为诗歌语言首先需要触及的“真实的花朵”,这是较早的对“及物性”的主张。<sup>②</sup>于坚则在一次访谈中提出“诗歌不仅要表现日常生活的诗意,而且要重建日常生活的神性”。<sup>③</sup>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则提出诗歌应追求“肉体的在场感”,亦即返回到一种没有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污染的“纯粹肉体性”的日常生活之中。<sup>④</sup>这几篇文章显然都有“站在日常生活一边”的诗学主张,尽管取向很不同。

而从诗歌文本来看,所谓“九十年代诗歌”的诗人们近三十年来致力于“日常生活书写”的代表性诗作至少包括:欧阳江河《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快餐馆》《时装店》,于坚《零档案》,韩东《甲乙》《你的手》,萧开愚《向杜甫致敬》《内地研究》,黄灿然《奇迹集》,张曙光《公共汽车的风景》,孙文波《六十年代的自行车》……这些诗作或诗集体现了诗人们在“日常生活书写”中的多层诉求。当代诗由此呈现出五种日常生活书写的基本类型:一是白描型的叙事

或清单、流水账记录(口水诗是其末流);二是段子化和欲望化的日常生活书写;三是对日常生活中伦理关系的呈现;四是书写日常生活之神秘美感和弱超验性的经验主义叙事诗;五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进行揭示的分析性诗歌/社会学诗歌。这五种类型涵盖了从口语诗、经验主义诗歌到知识写作的当代诗主要写法。

从诗学渊源来看,九十年代初开始兴盛的“日常生活诗学”的潜在种子在新诗开端处便已埋下,但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养分支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须言之有物”“惟实写今日社会之状况”“不避俗字俗语”等主张,已表明“新诗”之成立有赖于“平民社会”之生活及语言,《尝试集》中的部分作品(如《人力车夫》)可看成新诗中最早书写日常生活的诗作。不过,这条诗学线索很快被占据早期新诗主流的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诗学所压抑,成为了一条“隐脉”。其复苏或重新凸显要等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先是以“口语诗”的形式登场,在九十年代初发展为对“叙事”和“经验主义”的强调。除了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市民社会空前发展给诗人们提供了无穷素材之外,英语现代诗中的叙事诗和口语诗对中国诗人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九十年代诗歌”中的日常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英语现代诗中某些诗人学习的产物,如弗洛斯特、威廉斯、垮掉派(金斯堡等)、纽约派(奥哈拉等)、自白派(洛威尔等)、米沃什(英语化的)、希尼和拉金等人。

一些诗人和批评家试图将当代诗中的“日常生活书写”追溯到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击壤歌》和《诗经》,并认为中国诗中一直有一条“日常生活书写”的传统,杜甫和宋诗中的部分作品(范成大等人的田园农事诗)是其高峰。这样的观点固然有其理据,但不可忽视的是当代日常生活书写与中国古诗中的日常书写的重大差异:古诗中的日常生活是以农耕文明中的自然和伦理共同体为依托的,当代日常生活则是被现代官僚制和技术媒介组织起来的;古诗中的人在日月山川之间、在纲常关系中得到规定,其生命

处在关联和稳定之中,而当代诗中的人是原子化的“偶在个体”,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主导感受是孤独和消逝性。今天的诗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然“祛魅”和“理性化”的世界,个体的日常生活已经难以嵌入到古老的天道或神意秩序中。古诗中的日常书写所依托的世界图景是一个稳定、熟悉的自然和礼法世界——这样的世界在当代中国已经消逝。奥尔巴赫在谈论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的日常风俗小说时的观点,也大体适用于中国古典田园农事诗:“他的作品虽然生动传神,但运动只在画面里,画面背后死水一潭,那里的世界静止不动。这固然是一幅时代画卷,然而这时代似乎永远不变……不论是佩特罗尼乌斯,还是他的古罗马时代的读者,对这一切时代的制约性或历史性都丝毫不感兴趣。”<sup>⑤</sup>

### 三

“日常生活诗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兴起的时候,具有阶段性的正当与合理性,它使得诗歌得以摆脱空洞抒情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具体性,并拓宽了新诗内容和语汇的边界。但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一诗学理念早已暴露出了自身的局限和困境,它已经变成了又一种诗歌意识形态和诗学教条,将当代诗局限于一个貌似广阔、实则狭窄逼仄的空间之中。今天,从其中衍生出的各类流水账叙事诗(口水诗)、小反段子诗、情怀党生活感慨诗、私人自拍式诗歌,已经泛滥成灾。在“生活高于一切”的名义下,各种自恋、自我抚摸和自我玩味获得了一种新的语言形态——以前是沉溺于直接抒情,现在是沉溺于“讲自己的故事”。这些贫乏的写作,虽然不能说明“日常生活诗学”的上限,但可以表明其下限或“无下限”。这是由于,“日常生活写作”在其提出的时候主要是策略性的和偏于一端的,缺乏对诗歌的整全、周密的理解。

崔卫平写于1993年夏天的《诗歌与日常生活——对先锋诗的沉思》<sup>⑥</sup>是九十年代“日常生活诗学”中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诗学文本,其局限性和误导性也最为典型。崔卫平此文将“日常生活”视为当代诗

写作的精神原则,其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第一,“日常生活”即生活本身,“事件”不能改变日常生活的基本状况,因而“事件”是不重要的——人不应该渴望“事件”,而应安于日常生活,反对“日常生活”即反对生活本身;第二,日常生活所使用的日常语言是唯一真实有效的诗歌语言,越界性质的语言实验是对公共语言规则的毁坏;第三,强调诗人的写作需要具备一种“日常精神”,亦即一种注重技术细节的责任伦理和工作伦理,把写作当成一项日常工作。不难看到,崔卫平此文有三重思想来源:一是波普尔式的政治哲学对一切“大词”和“宏大叙事”的拒斥;二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对日常语言规则的公共性的强调;三是某种日常性的责任伦理和工作伦理,非常接近于韦伯在《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这两次著名演讲中的观点(“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sup>⑦</sup>),“今天的‘日常生活’也具有某种宗教性质”<sup>⑧</sup>)。崔卫平希望借此建立起当代诗的基本范式与边界,而诗人对“日常生活”的逾越将遭受指责。

我们可以从哲学、历史和诗学三方面对崔卫平此文进行反驳,这些反驳同时也是对整个“日常生活诗学”的批判。

在哲学上,“事件”作为突破日常生活的力量被崔卫平完全低估了。正如施米特所说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例外决定常规”,即“事件”决定“日常生活”:“一种关注现实生活的哲学不能逃避非常状态和极端处境……非常状态比规范更令人感兴趣。规范证明不了什么,而非非常状态却能证明一切……在非非常状态下,现实生活的力量打破了那种经过无数次重复而变得麻木的机械硬壳。”<sup>⑨</sup>有两种意义上的例外或事件:一种是主权者的决断事件(制宪或颁布“紧急状态”),另一种是生命对既有秩序的反抗事件(革命)。这两种事件都以某种方式决定了日常生活的样貌、状态和边界。一种完整的诗学必须看到“日常生活”与“事件”之间的辩证关系或相互转化性。一方面,事件开启出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时空,它更新

了日常生活,真正的事件就是使之前的世界完全不同于此后的世界的那种真理性的力量,比如“改革开放”就是规定着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的事件。只要诚实地面对历史,就会发现这样的事件虽然罕见和不可预期,但确实发生过。另一方面,事件的种子或潜能又来自于日常生活,正是在日常生活中潜藏着其自我否定的因素,不仅是作为日常可见的反日常情绪和不满冲动,而且作为恩斯特·布洛赫所说的“尚未意识”(The not-yet-conscious)和本体论意义上的“希望”经验存在于生命深处。<sup>⑩</sup>只讲日常生活,不讲事件,不讲根本结构发生革命性改变的可能,就是在剥夺人的希望。在泛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将一切革命、事件都贬低为灾难和乌托邦妄想之时,我们必须守住人类的希望。因此,完整的诗学必须同时包含“日常生活诗学”和“事件诗学”这两个部分,而不是仅仅只强调诗的日常方面。用巴迪欧的话来说,诗的本义和使命是“对事件的命名”,对当代诗来说就是在作为“情势状态”的日常结构中看到以往事件的痕迹和新事件的可能性——缺少“事件”视域的日常写作,注定是乏味的和平庸的。

在语言哲学方面,崔卫平对“诗歌不能突破日常语言”的主张是对维特根斯坦的误用:固然不存在“私人语言”,但一个共同体(诗歌共同体)可以一起发明新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也就是共同想象一种新的语言。这种对新语言的想象,始终是诗的职责所在。

从历史来看,崔卫平在当时没有意识到她所捍卫的那种“日常生活”本身是国家市场经济改革和意识形态调整的产物,同时也受到当代技术和媒介的深刻规定。“九十年代诗歌”植根于其上的“日常生活”是历史性的,它背后是19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语境。“日常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凸显,同时也是消费主义、利己主义和虚无主义侵蚀人们心灵的过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背后的历史逻辑,在慈继伟1994年出版的《中国革命的辩证法:从乌托邦到享乐主义》<sup>⑪</sup>中得到过很好的描述——当代诗从“八十年代诗歌”向“九十年代诗

歌”的转型,也从属于同一个大的历史逻辑。如此看来,我们今天所过的日常生活是由社会转型导致的,因此它早已深深嵌入到整体结构之中并完全被其规定。毫无反思地认同这种“日常生活”只会忽略在生活背后起塑造、支配作用的力量。

在诗学上,“日常生活诗学”企图垄断诗歌的真实性,它忽略了诗的可能性、诗学的复杂性与“日常生活”的歧义性,变成了排他性的诗歌教条。与此相关的诗歌教条主要有三个。教条之一是所谓的“经验主义诗学原则”:只有对日常经验的书写才能使诗歌走向沉稳和成熟。今天有大量的诗作都是奔着呈现日常生活的神秘性甚至神性去的。然而,日常生活不仅仅是神秘和诗意的,其中也同样充斥着无尽的压抑、规训和压迫。在列斐伏尔看来,尽管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交汇的地方”和“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但其中也充斥着异化和物化,被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支配。<sup>⑫</sup>从“日常生活”属于“再生产”(赫勒、阿尔都塞和女权主义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的视域出发,我们需要对“日常生活”进行多重批判,而绝不能只是单方面去写所谓“日常生活的颂歌”。

教条之二是“日常语言诗学原则”:诗的语言不能越出日常语法的边界,否则就是语言暴力和“语言法西斯主义”。这种预先划界显然是对诗歌活力的武断限制,好的诗歌往往在语言的实验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刀锋上行走。

教条之三是“写作必须成为一项讲求专业性的日常工作”,否则就是业余的和不入流的。这种工作态度对于诗人训练自身的诗艺、形成稳定的写作水准和风格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大量在“非工作状态”中(特别是事件作用于人之时)写出的杰出作品。在专业化的、每天写作的诗人之外,仍然有其他的诗人形态——他们可能写得很少,但他们活得很深;他们的生命主要投身于别的活动或行动,只是偶尔写一些诗,但这些诗同样值得珍视。“工作伦理”作为诗人的自律原则是很好的,但它不能成为评判一切诗人和诗歌的标准。

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生活固然包含着日常维度,但同样也包含非日常和反日常的维度,不能用“日常生活”这个子概念来涵盖“生命”或“生活”。生活从来都不只是日常生活,在重复性的日常实践之外,还有模仿性的实践和创新性的实践,还有神话冲动、朝向宇宙的想象和思辨,还有无人称的事件和被技术所打开的虚拟世界——这一切都属于生活,它们都需要得到诗歌的处理。今天的诗学需要建立在对生命和诗的更深刻、更完整的理解之上,这样才能打开通向未来的路径。今天的诗歌写作也需要容纳更深刻、更完整的生命现实:在日常性与非日常性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嵌合、交错、缠绕和对话性的关联,通过引入事件、神话、思辨、虚拟等视域或维度,来展示生活的整全形态。

#### 四

“日常生活诗学”的根本问题是放弃了(或者说弱化了)诗与更广大深邃的“场域”之间的关联。即使是在书写日常生活中的神性或超验性的诗作中,超验在被纳入到写作之中时其力量也被完全削弱了,只是一种“超验的残骸或痕迹”。这是由于,日常生活书写在根本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写作(即便在它暗示或指向超验之物时也是如此),它以个人主体的直观经验或感受为阈限和过滤原则,所有超越了个体经验之限度的东西都无法进入这种写作之中。这种书写由于预先排除了具有超强力量的重要事件或命运的降临(将其直接等同于不可信的“宏大叙事”),而无法真正涉及“作为超验的超验”(它在非日常的“异象”中出现,而不是在日常经验中显现)。

日常生活诗学固执于生命的有限性(“此时此地”“现在”和“附近”),却无知于生命的无限性。在现代个人主义、世俗主义和一种完全科学主义的视野中,生命才只是有限的;凡是具有与此不同的视野和经验的人,都深知生命同时是无限的,我们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与整个宇宙相连,在事件之力的作用中与历史相连,在无尽的生成中与他者相连。我们不需要以古典的宗教经验为依据来肯定生命

的无限性——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之上,我们也能够认定:生命(它远远超出“个体”)即是无限的生成和无限连接。

今天的思想不能再满足于有限性,而是必须重新回到无限性——尽管这里的无限性并非柏拉图、基督教神学、黑格尔哲学中的无限性,而处在巴迪欧、列维纳斯和德勒兹这三位不同思想家学说之间的某个中间位置。

批判日常生活诗学,就是要从一种“有限诗学”走向“无限诗学”。这一诗学的目的,是在每个人都已被技术、权力和资本撕成碎片的当代世界中,恢复生命的完整性和诗的完整性。

#### 注释:

①欧阳江河:《谁与谁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②西川:《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山花》,1995年第12期。

③于坚、舒晋瑜:《于坚:我要在诗歌中重建日常生活的神性》,《中华读书报》,2013年11月27日,第11版。

④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刊于杨克主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

⑤[德]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等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1页。

⑥崔卫平:《诗歌与日常生活——对先锋诗的沉思》,《文艺争鸣》,1995年第4期。

⑦[德]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

⑧[德]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页。

⑨[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2页。

⑩[德]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⑪Jiwei C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⑫[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日常生活社会学基础”,叶齐茂、倪晓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01-302页、第542页。